

赵超构与诗人刘岚山

◎文化史谭 方晓春

一代报人赵超构与诗人刘岚山，是交往颇深的老友。他们结识于重庆《新民报》时期，抗战胜利后到了上海，又二度共事于《新民报》。对于杂文大家赵超构，可谓妇孺皆知，但诗人刘岚山可能知道的人就不多了，他是一位活跃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诗人。

刘岚山（1919~2004），笔名胡里、路里，安徽和县人。他出身贫寒，父辈目不识丁，是从和县鸡笼山下走出来的诗人。他是新中国第一批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作家，著有《漂泊之歌》《乡下人的歌》《和平的前哨》《和英雄相处的日子》《人生走笔》等。

赵超构年长九岁，又曾是顶头上司，因而刘岚山对他总是多一份师长般的敬重，习惯称他为“赵老”或“超构先生”。而赵超构呢，则大大咧咧，总以兄称之。君子之交淡如水，他们长期保持着诚挚的友谊，一直到晚年。

上世纪30年代末，进步青年刘岚山带着《寻梦者的（漂泊之歌）》（刘岚山最早出版的诗集），从湖南湘潭出发，徒步四千里投奔革命圣地延安。当时的延安迫于国民党的包围与封锁，已开始向外疏散；因为他没有任何组织关系，所以未能被抗大或鲁艺接收。在南返途中，他还在被抓进了国民党西安集中营。

1941年，他辗转到达陪都重庆，与赵超构聚首于《新民报》。早三年进报社的赵超构，当时已是著名的主笔，开设了“今日论语”栏目，逐日撰写时评。刘岚山初来乍到，暂且当一名校对工，经常与当地一批进步的文学青年交往。

刘岚山进《新民报》是《华中日报》一位副刊编辑介绍的。当时《新民报》总编辑是赵超构，他与赵超构同庚，两人自诩为“二赵”，亲如兄弟，他们对这个爱好文学的校对工，十分赏识。重庆《新民报》期间，除了后来的“三张一赵”（张恨水、张友鸾、张慧剑、赵超构）外，初期他们三人关系最为密切。

当时的赵超构孤身一人在陪都，寂寞难耐，又因他人木讷拙直，落落寡合，缺朋少友。他与刘岚山之所以成为挚友，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，就是两人都有点小酒，是不可多得的酒友。刘岚山是有名的“酒仙”，5岁就跟着父亲喝酒了，一天三顿离不开酒。赵超构也不示弱，只要有人“凑脚”，他也能喝几盅。不过他们属爱喝酒而酒量不大的那种，老白干一小盏，农家酿一大碗。诗人木斧称“千杯不醉刘岚山”，只能说是朋友间的调侃。

那时，他们都是热血青年，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外文学名著，想方设法接触进步书刊。不管谁的手头有了一本好书，他们都会轮流着看，当年的几本《译文》旧杂志，还有涅克拉索夫的作品，都是他们竞相抢阅的床头书。《译文》杂志对赵超构影响很大，1953年《译文》（后改名《世界文学》）杂志重新创刊，虽然已时过境迁，但赵超构仍然情有独钟，坚持自费订阅数十年。

赵超构很快发现，刘岚山的心思不在报社，他的兴趣在搞出版、出丛书、办诗刊。果然不出所料，一年以后，刘岚山就离开新民报社，自立门户，在重庆陪都办起了“山野书店”。横贴在门头墙上的“山野书店”几个招牌字，出自书法家于右任之手。

赵超构偶尔会到刘岚山的书店逛逛，随便翻翻新到的书。兴致所至，他们还会在店堂里摆上小方桌，抿上几口老酒，侃大山。那一个时期，赵超构与刘岚山谈得最多的话题，就是如何搞出版、出丛书。抗战胜利以后，赵超构曾想以《延安一月》稿费、版税为基金，与新报人陈理源合作到上海开办出版社，原因均源于此。此事后因没有出版自由而“扼杀于摇篮之中”。

1943年旧历新年过后，一个鹅毛大雪漫天飞舞的日子，赵超构又来到山野书店，却

发现店门紧闭，一种不祥之感漫上心头。他四处打听消息，终获知刘岚山已回重庆，暂住南岸郊区炼油厂，在南方印书馆担任助理编辑。他还未及与对方取得联系，就得到刘岚山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消息，从此他便失去了联系。

二

1946年，赵超构从重庆回到上海创办《新民报》晚刊。某日，赵超构正在埋头写稿，突然从门外闯进一个蓬头垢面、灰不溜秋的人，定睛一看正是刘岚山。原来当年他因牵涉出版进步书籍而入狱二年，出狱后曾赴解放区，后家庭突发变故，便又辗转来到了人生地不熟的上海。

刘岚山在回忆文章中是这样叙述的：“我和老友吴清智到上海谋求职业，住在杨树浦工棚他哥哥吴清智家里，跑了几天，毫无所得，我遂前往圆明园路五十号新民晚报社找赵超构先生。”

赵超构见状，二话没说，就让他留了下来。因刘岚山在重庆校对出身，赵超构便先让他重操旧业。当时编“夜光杯”副刊的，是在上海滩负有盛名的诗人袁水拍。校对也有分工，刘岚山除了负责新闻稿外，还负责副刊，也帮忙计算稿费字数，偶尔也凑版面或补白——其实，他已参与了部分的编辑工作，因此与袁关系亲近，后来成为至交。袁水拍夫妇是苏州人，袁夫人做得一手好菜，赵超构与刘岚山偶或上门吃饭。三人喝酒吃菜，细饮慢嚼，好不尽兴。

1948年11月，赵超构与袁水拍等接受中共地下党的安排，先后“走避”香港。刘岚山临危接手“夜光杯”编务。据老报人张林岚说，此属于“私相授受”，换言之就是“教一个校对暂时照看一下，每天发点稿子填满版面”。

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，刘岚山一直坚持在岗位上，“夜光杯”在他手中一天也没有停过。到了次年三月，国内及上海形势愈发吃紧。刘岚山女儿夏晓虹教授在《父亲与新报》一文回忆：“某日，父亲突然接到国民党市党部的通知，要夜光杯编辑前去开会。父亲本有左翼倾向，处此局势，更觉危险。经与朋友反复商量、研究，一致认为这很可能是个抓捕的圈套。于是父亲急忙脱身，转赴皖南游击区。”

上海解放后不久，刘岚山穿着一身崭新的军装回到了新民报社，而此时，他已是军管会文艺处的干部了。新民报社举办一场“军民联欢会”，赵超构特地邀请刘岚山专门为此创作了一首两百多行的朗诵诗——《枪和笔大会师》，由一位诗协的朋友朗诵，受到了广大军民的欢迎。事后，新民报社以工会的名义，将《枪和笔大会师》印刷发行，赵超构在小册子前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言——《关于枪与笔大会师》。

赵超构在序言中写道：“本报上海版创刊三年来，走过一段崎岖曲折的道路，所有服务沪社朋友，几乎都尝到其中的艰苦，反动派的迫害、特务的威吓，加上通货膨胀造成的生活痛苦……这一切，在这篇朗诵诗中都有着很好的情绪表现。”

三

刘岚山是一位勤奋且独具慧眼的诗人与编辑，他兼职或专职担任“夜光杯”副刊编辑虽时间不长，却培养与发现了一批文学新人，著名的儿童文学家圣野当时还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，发表的第一首诗就是经他手在“夜光杯”刊出的，他还为其第一本诗集《啄木鸟》写过评介。

在上海《新民报》晚刊的三年，也是刘岚山创作的“井喷期”。他发表了大量的诗歌、散文等文学作品，其中颇具影响的是《中国



晚年的刘岚山先生 摄于1982年

作家访问记》系列采访，先后介绍了郑振铎、魏金枝、叶圣陶、臧克家、姚雪垠、陈白尘、马思聪、许杰等名家，有着很高的文学价值。另外，他还集结出版了《乡下人的歌》《领路的人》等著作。

在他走投无路、穷困潦倒之际，是赵超构与《新民报》接纳了他，使他有了施展文学才华的机遇与空间，让他有了继续追求光明的信心与勇气……所有的这一切，都让刘岚山感激在心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刘岚山离开《新民报》北上，在北京三联书店总管理处编译部任职。他不改“寻梦者”之初心，继续吟唱《漂泊之歌》。没过几年，他便又担任志愿军战地文化服务队队长，奔赴炮火纷飞的朝鲜战场……此后，赵超构与刘岚山就不常见面了。据袁水拍致刘岚山信函透露，他们晚年有通过信，刘岚山还声言赴上海看望赵超构，但终未能成行。

刘岚山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。不管岁月如何流逝，世事如何更替，他的心底始终隐藏着一个心愿，那就是要在有生之年为超构先生——“这位纯朴、醇厚、直爽和快人快语的长者”做一件力所能及的事。

1980年前后，已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诗歌散文组组长、编审职务的刘岚山，获知年届70的赵超构至今尚未出版杂文集，有点愤愤然。他认为赵超构和聂绀弩是“鲁迅先生而后的中国两大杂文作家，是鲁迅杂文的继承人、发扬者，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辉煌的杂文大家”。

有一次，社里的编辑季涤尘去上海组稿，刘岚山特地委托他去看望赵超构，希望林放写的“未晚谈”杂文编选成集，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可结果事与愿违，赵超构不领刘岚山的情，托词婉言谢绝了。此时，刘岚山才真正意识到，为超构先生做一件事的愿望，恐怕赵超构是不会给他机会的。

“赵是个好人”，这是袁水拍给刘岚山通信时随带提到的一句话，在刘岚山平静的内心引起了强烈的震撼，他说“这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呼唤”。他在《我和袁水拍——兼悼赵超构先生》一文中，这样评价赵超构和袁水拍：“他们是奇伟的‘好人’！”“是伟大的诗人和杂文大家！”在未来的中国文学史上必将记载他们的功绩！”

◎史林偶拾

我是校长，我不该生气

□张达明

马寅初曾留学美国，其间养成了洗冷水澡的习惯，回国后在担任北大校长时，依然坚持洗冷水澡。他将自己洗冷水澡称为“热冷水澡”，并解释道：“先用热水洗澡，再用冷水冲洗，这样就能加速血液循环，延缓衰老。”还多次在学校演讲时谈及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洗冷水澡的乐趣，滔滔不绝讲起自己在寒风刺骨的河岸上，光着身子往冷水里跳的刺激场景，“凉水一激，汗毛孔里的污垢就出来了。”有学生当面对他赞扬道：“听了您的演讲，有一股扑面而来的热情和不加修饰的真率，真好！”

受此鼓舞，马寅初写了一篇题为《洗冷水澡的八大好处》的文章，送到北大校刊要求发表。当时，翦伯赞任历史系主任，并负责校刊工作。他在看到这篇文章后，皱着眉头说：“这

样的文章怎么能在校刊上发呢？”便行使了否决权不让发。

马寅初知道后颇有意见，在一次开会时质问翦伯赞：“我那篇文章挺好的，为什么不让我发？”

翦伯赞说：“我是负责校刊的，我说不能发就不能发。”

马寅初愣了一下，说：“好好好，不就是一篇文章吗？不发就不发吧，值得你生这么大的气吗？”

翦伯赞“扑哧”乐了：“马校长，请您搞明白，是我让您发您的文章，我为什么要生气？”

马寅初也不由笑道：“听您这么一说，让我忽然想起我自己是校长，我不该生气，我要有他人不能容的大肚量，这样才算得上是一个好校长，是不是？”

和尚这条路亦当留着

□庄月江

第一次国共合作时，两党的政治主张中，都有“毁灭宗教”一条。一时间，寺院僧尼无不惶恐。1927年春，何应钦率东路军入浙，杭州的宗教界人士更是胆颤心惊，惶惶不可终日。

这时，弘一法师李叔同正好云游到杭州，知道这一情况后，即将中共高级干部宣中华请到他驻锡的虎跑寺，向宣中华讲述不可毁寺院灭宗教的缘由。宣中华是李叔同在浙江第一

师范教书时的学生。他当时既是中共中央委员，又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领导人之一。李叔同开门见山地对他说：“和尚这条路亦当留着。”

李叔同这句话，给宣中华启发很大。事后，宣中华逢人便说：“生平未尝受刺激如今日之深者。闻李先生之言，不觉背出冷汗。”

马叙伦先生在《石屋余沈》中谈到此事时，认为寺院未毁，虽“因缘多方，时势为之”，但弘一法师的这句话，无疑是阻止北伐军毁寺院的“有效之言”。

“白菜”换不来白菜

□徐大钧

齐白石晚年在画坛已功成名就，与吴昌硕并称“南吴北齐”。

那年初冬的一天，齐白石正在家中精心作画，画的是其蔬果绘画作品中最喜爱的“白菜”。北京的冬天朔风扬沙，薄阳朦胧，风声传来一阵阵叫卖白菜的吆喝声。当菜农来到白石老人门口的时候，卖白菜的吆喝声引起了老人的注意，齐白石一时心血来潮：何不将自己画的那幅“白菜”换菜农的那车白菜！

当齐白石拿着他的这幅水墨白菜画，兴冲冲地出门唤住了那个菜农。菜农一听喜笑颜开，忙上前打招呼，问道：“老先生你要几颗白菜？我给你挑。”只见齐白石拿出刚才画的水

墨白菜画说：“我拿这画的白菜，换你这一车白菜，怎么样？”菜农一听，头摇得像浪鼓似的，他种菜为的是吃饭，卖了菜才能买粮食、应付家中的日常开销。这幅画拿回家，能有什么用处？

齐白石见菜农不答应，走上前去报出了自己的名号，还对菜农说明自己的画能值多少钱，这一幅画抵一车菜绰绰有余。但在菜农看来，这假白菜怎么能与他的真白菜相比，他真的想当场发作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这个老头儿真没道理，要拿他的假白菜换我的真白菜！”

事情的结局大大出乎齐白石的意料，他画的“白菜”居然换不来一车真的白菜。对此，齐白石也只能自嘲一声，摇头作罢。

巧谏皇帝

□唐宝民

《墨客挥犀》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：北宋祥符年间，官员的工资普遍偏低，三班奉职的月俸仅七百钱，外加驿券肉半斤。这点钱，比较当时的消费水平，的确不高，于是，许多官员都希望涨工资，但涨薪水的事得老板（皇帝）点头。老板贵为天子，自古伴君如伴虎，向皇帝提加薪的事，如果惹得皇帝不高兴，认为你没有奉献精神，那后果就严重了。因此，大家里都希望涨薪水，但谁也不敢和皇帝提。有一个官员就想出了一个办法，他在驿舍的墙上题了一首诗：“三班奉职实堪悲，卑贱取寒即可知。七料钱何日富？半斤羊肉几时肥？”驿舍是人来人往的地方，所以，这首诗一出现，便立即引起了围观，大家纷纷议论这件事，产生了轰动效应。此事自然就传到了皇宫里，引起了皇

帝的关注，有太监便把这首诗抄给皇帝看，皇帝看过后，说道：“这样怎么能要求官吏廉洁呢？”于是，立即下令给官员们增加了月俸。

《南唐书》中记载的一件事，也是关于向皇帝进谏的：南唐皇帝李昇在位时，苛捐杂税过多，商人苦不堪言，许多大臣看到这种情况，都想建议皇帝减免税收，但又不敢直接和皇帝提，怕惹得皇帝不高兴。教坊长申渐高也一直想劝皇帝减免商人的赋税，这一年，京城大旱，皇帝在北苑举行宴会，在聊天的时候谈到了天气，便问大臣们说：“现在境外都下起雨来，唯独京城不下雨，难道是我们监狱中有冤枉的事违背了天意吗？”申渐高一听，感觉机会来了，便笑着说：“这雨是怕抽税，所以才不敢进京城啊！”皇帝听罢，哈哈大笑起来，众人也都跟着笑了起来。皇帝明白了申渐高的良苦用心，立即宣布免去一切额外税收。

◎老照片 每一幅照片背后，都有一个故事
每一个故事后面，都有一段历史



读报抓学习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黄岩县焦坑公社凉棚岭（村）生产大队贫下中农协会主席叶根土对两个儿子的教育抓得很紧，要求十分严格，要他们以共青团员的标准对照自己的工作和学习，并且要求他们每周两次向社员读报，讲解报上登的国家大事和各地信息等。

照片拍摄者：徐永辉

俄国人对李鸿章的评价为何很低

◎烛照西窗 程万军

清朝统治中国近三百年，这三百年间，中国人很少走出国门，而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很少能“上得台面”，更难得到外国人好评。1896年，清国洋务大臣李鸿章访俄时，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评论对李的印象说：“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，他是高度文明的，但从我们欧洲的观点看，他是没有享受什么教育，也并不文明。”维特曾经和李鸿章做过长时间交流，交流的结果写在维特后来的回忆录中，其中一结语耐人寻味——“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——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。”

俄国人为何说李鸿章不文明呢？他可是当时中国的“优秀官员”。

《维特回忆录》记录了李鸿章很多个人陋习，比如女士面前抽烟、随处吐痰，但最令俄国人不屑的是李的视野——不懂世界大势。

至今人们提起夜郎国来，还以为它是面积问题。殊不知，眼界视野比面积更致命。夜郎国地处汉代中国的西南，就国土面积而言，并不算汉朝邻国中最小的，司马迁的《史记·西南夷志》中记载：“西南夷君长以什数，夜郎最大。”夜郎国君又唤“滇王”。可见，夜郎国最起码在西南不算小国。之所以落了个“自大”的千古嘲笑之名，不是因为

“不值一提”，而是因为“自视甚高”，“滇王”不知有汉，还要与汉比比“孰与我大”。

夜郎自大，是因为道不通，所以才“以为一州主，不知汉广大”，情有可原。但如果道路四通八达，却奉行闭关锁国，那么纵然是泱泱大国，又有什么资格嘲笑夜郎国呢？

时光流转到19世纪，世界有了新的嘲笑对象：大清国。这个国家君臣与英国打了两年仗，却还不知道“日不落”帝国的最高领导是个女人，君主立宪是怎么回事。整个大清国充满着以天朝大国自居的优越意识，甚至把英国的富庶都说成是中国的恩惠，从不认为对方文明比中国先进。

作为经常接触国外的外务大臣，李鸿章同样目光短浅。他在国外经常抒发诸如“中国文物制度，事事远出西人之上，独火器万不能及”，竟然把中西差距，仅仅归纳为“兵器差异”，看不到西方强盛的政治本源，从而引为世界笑谈。

持有如此对世界先进文明无知的心态，怎么可能海纳百川，从根本上奋发图强？“最懂外交的人”尚且如此，那么闭着眼睛睡觉的人就更不用提了。一动不动，一成不变，不喝海水，不溶世界——十九世纪，华夏文明是一块无法融化、不可燃的“固态冰”。